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好书
docsi
入驻商家
历史川网
古籍书城

历史川网
古籍书城
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四书大全校注（上）



【明】胡广 杨荣 金幼孜等 纂修
周群 王玉琴 校注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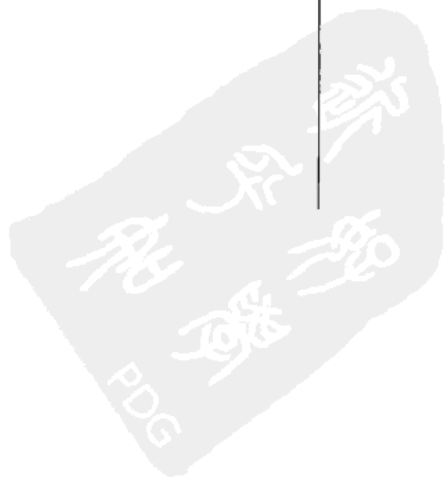
四书大全校注（上）

〔明〕胡广 杨荣 金幼孜等 纂修

周群 王玉琴 校注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4期。

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思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③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①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璘、周鏜、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②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年）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

^① 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廿二史札记》卷30。

^② 赵翼著、王树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①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年）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徠，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②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

①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 1905 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 1861 年沙俄废奴和 1868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①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才能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得以继续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5、635 页。

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1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前4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4年（2010—2013年）内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7册10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8年12月28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上

前言	周 群 1
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	6
御制性理大全书序	朱 棣 8
四书集注大全凡例	9
大学章句序	11
读大学法	19
大学章句大全	21
大学或问	85
中庸章句序	131
读中庸法	138
中庸章句大全	140
中庸章句大全上	140
中庸章句大全下	194
中庸或问	249
中庸或问卷上	249
中庸或问卷下	274
读论语孟子法此朱子采二程子说	311
论语集注序说	315
论语集注大全卷一	322
论语集注大全卷二	349
论语集注大全卷三	373
论语集注大全卷四	398
论语集注大全卷五	417

论语集注大全卷六·····	441
论语集注大全卷七·····	471
论语集注大全卷八·····	502
论语集注大全卷九·····	523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	546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一·····	564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二·····	587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三·····	612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四·····	63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五·····	66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六·····	684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七·····	697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八·····	72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九·····	733
论语集注大全卷二十·····	750

前 言

《四书》自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年)朱熹刊行以来,遂成为在中国影响至大的思想文献。宋学肇兴,《四书》更超越于儒家经典——“五经”之上。元代儒士也十分重视《四书》,吴澄15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刘因本于卢孝孙之《四书集义》而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许谦作《读四书丛说》四卷,詹道传作《四书纂笺》二十八卷,朱公迁作《四书通旨》六卷,倪士毅作《四书辑释》二十卷,等等。其中尤以《辑释》(详后)、《纂笺》与《通旨》成就为大。《纂笺》正音读,考名物,学风务实。《通旨》将《四书》原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①当然,《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对《四书》的流布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永乐年间纂成的《四书大全》。

明代初年,解缙上书建议修书,方法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②,也就是要远溯先秦儒学之绪,近承宋代理学之脉,这实际开启了明代修三部《大全》的先声。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谕曰:“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③虽然上谕要求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但其后又下诏催促成书。永乐十三年九月,《四书大全》编成,明成祖朱棣御制序文,颁行天下。就其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主要是承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成,诚如魏裔介所言:“《集注》者,《四书》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注》之孝子忠臣也。后之欲窥圣人之道,非《集注》何由进,非《大全》则《集注》之微言奥义亦几不明。”^④该书援据的蓝本是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对于《四书辑释》的成书缘起,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有云: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幹)有《论语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四书通旨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01页。

②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③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④ 《兼济堂文集》卷三《四书大全纂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德秀)，名曰《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宗道)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后有蔡氏(模)《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栎)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①

但自从明永乐年间《四书大全》纂成，颁之学官之后，诸书皆废。对《四书大全》的不足之处，顾炎武已有批评，谓其内容“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而《五经大全》之“《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乃至视其为“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之作。其实，顾炎武所谓“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也难说是允评，《四书大全》的作者并没有“欺”、“诳”之意。刊行之时，该书的《凡例》即明文写道：“凡《集成》、《辑释》(即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其《凡例》所列，凡一百又六家，也就是说该书的本意即是综汇众说而成一统。这其实也是朱棣的御旨，据《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记载：“(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择取的标准以“发明经注”为是。明代修纂三部《大全》的主观动机是“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当然，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启百世儒林之绪”更是如此，后世的儒士们并没有完全为《四书大全》的奉敕而作所牢笼。其后不久，阳明心学兴起，形成风行天下之势，更改变了程朱的为学路径。但“章一代教学之功”恰恰道出了《四书大全》对明人科考、教育的巨大影响。据《明史·选举志》记载：

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②

明代科选，基本沿唐、宋旧制，但试士方法有所改变，这就是考试内容“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命题试士”^③。即都以《四书》、《五经》试士。而自《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以后，诸注疏皆废，成为科考的不二标准，乃至其后“二

^①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49~650页。

^②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94页。

^③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93页。

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①。也就是说，该书不但被悬为功令，还是庠序课读的范本，进德修业的标准，即如学者所记之“颁诸学宫，永为遵守”^②。于是该书滋育了一代代的儒士，明代儒士如薛瑄、王守仁等“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风俗，上有纪纲，下重名节。当变故之秋，率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大于人心，群起而议”^③。当时风教敦穆，高攀龙认为这都与教育、科考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儒士深受《四书》、《五经》的沐染有密切关系。

其实，《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科举的重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从对《四书大全》成书的远近渊源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书大全》之成书，实乃宋元明儒的共同创作，该书从某些方面体现了《四书》在宋元明的流变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论理学必称宋明，元代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隐而不彰，其实，元代不但在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元代儒士们对《四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他们的孜孜努力，明代理学才在此基础上进入新的境界。可以说没有元儒的研究作为基础，就没有《四书大全》。此外，《四书大全》在明代被悬为功令，对明代儒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就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中除了朱熹的《章句集注》之外，主要引述的是元代儒士的成果，也就是元代儒士对《四书》以及《章句集注》的理解成为明代儒生们为学的基础，为人的准则，内化于明代士人们的心灵深处。更广而言之，此后的理学也抹上了元儒的色彩。因此，了解《四书大全》的学术源流、成因，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对元明以来数百年文化传统的认识、判断的问题。而朱熹虽然对于《四书》功莫大焉，然著述繁多，辨说亦多，其间也偶有问答未及审核者，亦有后来考证未及追改者，还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因此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亦不一而足，即使《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也时有牴牾。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熹之书的儒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真伪、年月先后，往往执于一见而诋排众论。《四书大全》则汇次了有关《四书》的诸家众说，各援所据，不但使朱熹的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对于理解《论语》等儒家经典亦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四书大全》乃仓促成书，时人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④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亦有云：

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于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余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

①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

②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三《四书集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

④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①

基于《四书大全》的成书背景，今点校《四书大全》，固然需要再现明代功令之原貌；同时，还需要尽量克服原作仓促粗疏之憾，以利传承学术；更由于《四书大全》之成书，乃是经历了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而并非明人胡广等人的一时之作，其中熔铸了大量宋元学人的劳动，因此，我们此次选取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庆源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陆陇其三鱼堂刊本（1698年嘉会堂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四书大全》所援引之原始文献进行校勘。之所以选择弘治本为底本，是因为这一刊本除了胡广等人所撰的《四书大全》之外，还附了王元善的《通考》及黄洵饶之《附纂》。其中王元善之《通考》大量采辑了程复心之《四书章图》，以及许谦、朱公迁、吴澄、吴程等人《四书》研究成果。诚如其于《大学或问》终页题识所记：“《四书大全》旧板漫灭，翻刻讹谬，本堂敬求颁降原本，命善书者抄誊绣梓印行天下，视他本大不侔矣。”确实该版本刊刻虽不十分精美，然内容颇为准确可依。选择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本作为参校本之一，主要是因为三鱼堂本订讹辨析尤多。四库馆臣谓之：“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虽然对其中的讹误未能全部廓清，但是就学术而言，该书已较原著有所改进。该书是陆陇其历六年而成的精心之作，且经过周纁等86位后学门人以及38位姻戚同宗精心校对而成。弘治本与三鱼堂本、四库所收永乐本参校聊可弥补永乐本《四书大全》仓促成书之不足。当然，由于三鱼堂本篇帙浩繁，此次校注不得不将书中所附明蔡清《四书蒙引》、林希元《四书存疑》以及陈琛《四书浅说》等割舍。同时，由于《四书大全》是一部广采众书而成的著作，因此，此次校注力求索寻所引文献原作进行校对，期以更符合原貌。当然，由于《四书大全》被悬为功令，异文并不多见。

《四书大全》所引注文的内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直接引述原文，有些间接引述大意。此次标点，对有文献可依凭的不是原文的材料不用引号，其余的引文用引号标出。朱熹作《或问》是因“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②。亦即朱熹《或问》中的问答语都是朱熹所言，因此，本书对《或问》中的问答语不一一以引号标出，以求文理贯注。当然，由于《四书大全》所据文献存佚也各有不同，我们虽然尽可能搜寻诸种原始文献，但其中的疏漏可能仍有不少。

《四书》原文以及朱熹集注文字宋元明诸儒士训注已颇为详尽，因此，此次训注，主要对一些颇为鲜见的人名、地名，古今殊异的词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之外注文所涉的有关内容进行简要诠释。

《四书大全》乃明人编纂的一部著作，内容概可分为四个层次：一、《四书》原文。二、朱熹《章句集注》、《或问》文字。三、宋元明诸儒对《四书》、《章句集注》、《或问》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三鱼堂四书大全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14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四书或问》提要，中华书局本，第294页。

的诠释文字。四、对宋元明诸儒所引文字的释文。本书据此四个层次分别采用不同的字号。因注文内容浩繁，《论语》、《孟子》原文以及朱熹《或问》内的段落难以显示，因此，我们汲取了原刻的标示方法，即将四书原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的段落开始以○标出，期以在标识段落的同时，又不断原文脉理，保持原文风貌。原文又因朱熹所撰《论语序说》和《孟子序说》中朱熹自有注文，为了以示区别，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字体标出。

本书王玉琴博士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王逊参加了部分点校工作。本书注文参酌吸取了有关《四书》的既有成果，因为注文条目琐细，谨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谅解。本书初稿完成后，承陈文新先生仔细审读，提出了诸多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订正了许多讹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学识所限，加之全套丛书行将付梓，虽然主编陈文新教授一再宽宥时限，但因篇制较大，仍感时间甚促，校注之讹误之处一定还有不少，谨祈读者批评指正。

周 群

2009年2月20日于南京大学

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

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臣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臣金幼孜等，兹者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学之臣，编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今编辑已成，谨誊写二百二十九卷，装潢成帙进呈，臣广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

上言伏以六经之道，昭如日星，经纬乎天地，贯彻乎古今，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用之于身而身修，行之于家而家齐，推之于国而国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盖世必穷经而后道明，未有舍经而能治理者也。是以圣王垂宪，必资道以开人；贤哲肇基，必稽古以作范。故伏羲则《河图》而演画，大禹因《洛书》而锡畴，孔子删《诗》、《书》，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陈王业，制礼乐，弘百世之规，况乎精一执中之传，尤重于丁宁告戒之旨。如斯显迹，昭然可观。自王道既衰，异说蜂起，燔烈秦火之余，穿凿汉儒之弊，其间存者不绝如丝，莫能究其指归，一切趋于苟且，夤缘故习，鲜克正之於乎！圣人之道不得，而百世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而千载无真儒，遂令往辙之难寻，益发前修之永叹。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关闽之学兴，而后尧舜禹汤之道著。悉扫蕪芜之弊，大开正学之宗。不幸屡阨狂言，既扬复抑，又因循数百年之间，卒莫能会其说于一，盖必有待于今日者矣。

天启圣明，诞膺景运，太祖高皇帝天纵之圣，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兴太平，首建学校。颁赐书籍，作养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内外，翕然同风。钦惟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智，纘承大统，绍述鸿勋，成功盛德，虽三皇而无以加；事业文章，与二仪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犹以为未至，功已成而犹以为未成。体道谦冲，游心高远，乃者涣起宸断，修辑六经，恢拓道统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发舒幽曠，钩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为前圣之辅翼。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地负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兴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断不续之坠绪，复属而复联；已晦不明之蕴微，复彰而复著。肇建自古所无之制作，纘述自古所无之事功。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焕然极备，猗欤盛哉！窃尝观之，周衰道废，汲汲皇皇，以斯道维持世教者，惟师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为之君，能倡明六经之道，绍承先圣之统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

臣广等一介书生，粗知章句，《大学》贤关，浑未造其阃奥，圆冠方屨，固惭列于章缝。幸逢熙洽之时，谬忝校勘之任，每受成于指教，亦何假于施为？乐睹就编，岂胜欢庆，与天下而同惠，于万古而有光。尊所闻，行所知，求不负于教育；正其谊，明其道，期补报于升平。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永乐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臣胡广等谨奉表。

御制性理大全书序

朱 棣

朕惟昔者圣王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为治也。下及秦汉以来，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所以天下卒无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泽，可胜叹哉！夫道之在天下，无古今之殊；人之禀受于天者，亦无古今之异，何后世治乱得失与古昔相距之辽绝欤？此无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岂道之病哉？其为世道之责，孰得而辞焉？夫知世道之责在己，则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则道岂有不明不行，而世岂有不治也哉？

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基即位以来，孳孳图治，恒虑任君师治教之重，唯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所谓道者，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朕为此惧，乃者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又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类编为帙，名曰《性理大全》。书编成来进，总二百二十九卷，朕间阅之，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大哉！圣人之道乎，岂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锱梓，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异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皞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遂书以为序。

永乐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四书集注大全凡例

《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

注文下凡训释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陈氏之说。

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熹 晦庵 仲晦 新安。郑氏玄 孔氏颖达 周子敦颐 濂溪 茂叔 程子颢 伯淳 明道 颐 正叔 伊川 张子载 横渠 子厚 邵子雍 康节 尧夫 蓝田吕氏与叔 大临 和靖 尹氏焯 彦明 上蔡谢氏良佐 显道 广平游氏酢 定夫 建安 河东侯氏师圣 仲良 龟山杨氏时 中立 安定胡氏瑗 翼之 海陵 华阳范氏祖禹 淳夫 眉山苏氏轼 东坡 子瞻 林氏之奇 少颖 三山 致堂胡氏寅 明仲 豫章罗氏从彦 仲素 沙随程氏迥 可久 延平李氏侗 愿中 象山陆氏九渊 子静 东莱吕氏祖谦 伯恭 金华 南轩张氏栻 敬夫 广汉 止斋陈氏传良 君举 乐庵李氏衡 彦平 江都 山阴陆氏佃 农师 北溪陈氏淳 安卿 临漳 勉斋黄氏榘 直卿 三山 庆源辅氏广 潜庵 汉卿 三山潘氏柄 瓜山 谦之 节斋蔡氏渊 伯静 九峰蔡氏沈 仲默 觉轩蔡氏模 仲觉 三山陈氏孔 硕 北山 肤仲 赵氏 潜室陈氏埴 器之 永嘉 胡氏泳 桐原 伯量 南康 郑氏南升 括苍叶氏贺 孙 知道 味道 莆田黄氏士毅 子洪 格庵赵氏顺 孙 栝苍 丹阳洪氏兴 祖 庆善 张氏九成 子韶 范阳 邓氏名 亚 元亚 西山真氏德 秀 景元 建安 叶氏梦 得 石林 少蕴 邵氏甲 仁 仲 新定 兼山郭氏忠 厚 立之 蒙斋袁氏甫 广微 四明 张氏庭 坚 才叔 江陵项氏安 世 平庵 徽庵程氏倪 氏 晋川 顾氏元 常 平甫 新定 仁寿李氏道 传 仲贯 东窗李氏 陵阳李氏 温陵陈氏知 柔 体仁 陈氏用 之 长乐 谭氏惟 寅 高安 何氏梦 贵 北山 新之 严陵 晏氏 天台潘氏时 举 子善 郑氏汝 谐 东谷 舜举 古栝 新安王氏炎 晦叔 永嘉薛氏 欧阳氏谦 之 希逊 庐陵 诸葛氏泰 朱氏祖 义 子由 庐陵 朱氏伸 梅岩胡氏次 焱 济鼎 新安 张氏彭 老 黄氏渊 宣氏 汪氏廷 直 张氏好 古 张氏玉 渊 王氏回 双峰饶氏鲁 仲元 广信【校记：“广信”弘治本、三鱼堂本作“鄱阳”】 玉溪卢氏孝 孙 勿斋程氏若 庸 达原 新安 刘氏彭 寿 鲁斋王氏侗 金华 番易沈氏贵 瑤 毅斋 叠山谢氏枋 得 君直 广信 番易齐氏梦 龙 节初 邢氏曷 蛟峰方氏逢 辰 青阳 仁山金氏履 祥 吉甫 金华 厚斋冯氏椅 奇 之 南康 四如黄氏仲 元 莆田 勿轩熊氏禾 去非 建安 新安吴氏浩 义 夫 吴

氏仲迂 可堂 番易 番易李氏靖翁 思正 番易邹氏季友 晋昭 汪氏炎昶 古逸 新安 鲁
斋许氏衡 平仲 临川吴氏澄 草庐 幼清 欧阳氏元 圭斋 原功 云峰胡氏炳文 仲虎 新
安陈氏栋 定宇 寿翁 张氏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士毅 仲弘【校记：“仲弘”四库本无，据
弘治本、三鱼堂本补】 番易朱氏公迂 克升【校记：四库本无番易朱氏，据弘治本、三
鱼堂本补】 东阳许氏谦 白云 益之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各与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云峰胡氏曰：“朱子四书，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义曰心之制、事之宜；礼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皆兼体用，独智字未有明释。尝欲窃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番禺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新安陈氏曰①：“《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六经言性自此始。谓天降生民而与之以性，亦本书之意而言。”【通考】②程氏复心曰：“仁义礼智四者，具于人心，乃性之本体，此谓天地之性也。”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新安陈氏曰：“性之所有，即仁义礼智是也。性无智愚贤不肖之殊，惟气有清浊，清者能知，而浊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质有粹驳，粹者能全，而驳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属知，全性之所有属行。知行二者，该尽一部大学，意已寓于此矣。”【通考】程氏复心曰③：“气出于天性，亦命于天性，是这理气，则已属于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气便有不齐，气是初禀底，道是成形了底，只阴阳五行之气，裹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贤，精英中渣滓者为愚不肖，此所以为气质之性。”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通考】吴氏程曰④：“尽，上声，徐忍反，尽之也，旧作子忍反，凡‘终尽’之‘尽’，则上声，慈忍反。”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平声，下“治人”同。而教之，以复其性。问：“何处见得天命处？”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已前圣

① 新安陈氏：陈栎，字寿翁，一字定宇，晚称东阜老人，休宁人。为学以朱子为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

② 通考：王元善《四书通考》中的注文。

③ 程氏复心：程复心，字子见，元婺源人，徽州路儒学教授。自幼沉潜理学，其《四书章图》隐括《总要》、《发义》二卷，另撰《四书纂释》二十卷。

④ 吴氏程：吴程，字伯章，婺源人。（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九载其传云：“吴程，字伯章，婺源人，隐居读书，所著有《四书音义》，休宁朱升更其名曰《四书经传释文》。”

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虽不为帝王，然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陈氏曰：“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是就清浊粹驳不齐中，指出极清极粹者言之。聪明睿智，生知之圣也，与知其性相应；能尽其性，安行之圣也，与全之相应。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于中下一而字，圣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说。天必命之以为亿兆君师，君以治之，师以教之，变化其气质，而复还其本性。以上四个性字，须融贯看透。三代以前，圣贤之君，君师之责兼尽。三代以后，君道有略得之者，而师道则绝无矣。”【通考】东阳许氏曰①：“礼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质之称。尽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极兼上‘知’、‘全’两字。”程氏复心曰：“聪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复其性，将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书·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阙一，就中乐之教尤亲切。夔教胥子，只用乐。大司徒之职，也是用乐。盖是教人朝夕从事于此，拘束得心长在这上面。盖为乐有节奏，学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换了他性情。”云峰胡氏曰②：“司徒之职，统教百姓；典乐之官，专教胥子。”新安陈氏曰：“上文说其理，此实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赋与之，不能教之。圣君代天立标准，以主教于上，而设司徒及典乐之官，以掌教于下。此时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备，学之名未闻也。”

三代之隆，其法寢备③，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上声，又去声。扫、去声。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子曰：“古者小学，已自是圣贤坯朴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番易齐氏曰④：“洒扫，《内则》所谓‘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曲礼》所谓‘为长者粪，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类是也。应对，《内则》所谓‘在父母之所，有命之，应、

① 东阳许氏：许谦(1199—1266年)，元金华人，字益之。受业于金履祥，尽得其所传。延祐初，居东阳八华山讲学，学者甚众。里居四十年，公卿屡荐，皆不起。晚年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白云先生。有《白云集》。《元史》入《儒学传》。《宋元学案》卷八十二有《文懿许白云先生谦》。

② 云峰胡氏：胡炳文，字仲虎，元婺源人。笃志家学，又潜心朱熹之学，上溯伊洛，以达洙泗渊源。仁宗延祐中，以荐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调兰溪学正，不赴。至大间，建明经书院，以处四方来学者，儒风之盛甲东南。所居面山，世号云峰先生。著有《易本义通释》、《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四书通》、《大学指掌图》、《五经会义》、《尔雅韵语》等书。《宋元学案》卷八十九有《山长胡云峰先生炳文》。

③ 三代之隆，其法寢备：三代隆盛，制度完备。三代指夏、商、周。寢备：逐渐完备。寢：逐渐。

④ 番易齐氏：(宋)俞琰《读易举要》卷四：“鄱阳齐梦龙，号节初，解六十四卦象辞与彖传混为一说。”“登戊辰第，与黎时中同榜，丞相江古心之门客。”又(清)陈昌图《南屏山房集》卷二十“《周易附说卦变图》，宋齐梦龙撰。按，梦龙字觉翁，德兴人，景定时登第”。未知孰是。

唯敬对’。《曲礼》所谓长者‘负剑辟咤诏之’。负，置之于背；剑，挟之于旁。口耳之间曰咤。辟咤诏之，倾头与语。则掩口而对之类是也。进退，《内则》所谓‘在父母之所，进退、周旋慎齐’。《曲礼》所谓‘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之类是也。礼习于度数之节文，所以教之中也。乐明于声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挟四矢，验其中否，以观德行。御法，一车乘四马。御者执轡，立于车上，欲调习不失驱驰之正也。书，书字之体，可以见心画。数，算数之法，可以尽物变。《周礼·大司徒》，所以‘教万民而宾兴之’者，始以六德，继以六行，后及于六艺，非八岁以上者所能尽其事，不过使晓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节，有品节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谓也，非其事也。”勿轩熊氏曰①：“按《大戴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注曰：小学为庠门，一作虎闾，大学在王宫之东，束发谓成童。《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太子之礼也。’按：年数互有不同，而朱子独以《白虎通》为断。”【通考】吴氏程曰：“寢，渐也。洒，《论语》惟色买、所绮二反，世俗读作色买反，本之《内则》音义与‘扫’字，皆去声，以类相从为顺，今并读作去声，后不复出。数，所遇反，旧音，凡以数计者，如《论语》‘数年’、《孟子》‘数口’之类，皆所主反，今并作去声，后仿此。”东阳许氏曰：“按注疏所言，闾里以上，凡乡州党族遂县鄙酈，皆有学，但闾里之塾为小学，餘皆大学也。”程氏复心曰：“《周礼·大宗伯》五礼之目：吉礼：十有二一，禋祀二，实柴三，牺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鬯辜七②，肆献八，馈食九，祠十，禴十一，尝十二。烝凶礼：五一，丧二，荒三，吊四，禴五。恤宾礼：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会六，同七，问八。视军礼：五一，师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礼：六一，饮食二，昏冠三，宾射四，飨燕五，赈膳六。嘉庆。六乐：一、云门，黄帝乐一云尧乐，象云气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黄帝乐，亦云尧乐，象池水周遍，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大磬，舜乐。磬，绍也，以其绍尧之业而能齐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四、大夏，禹乐。夏，大也，以其大尧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汤乐。濩，护也，汤宽仁而能救护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乐。传云：武王以黄钟布牧野之阵，归以大簇，无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贯侯过，见其鏃白也。二参连，言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也。三剡注，谓羽头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褭。《周礼》《释文》音让，谓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也。五井仪，谓四矢贯侯，如井字之容仪也。五御：一鸣和鸾，和鸾，皆铃也。和金口木舌，鸾金口金舌，所以节车之行。鸾在衡上，近在马，和在式上。衡是车前横木，驾马者即轨。式是

① 勿轩熊氏：熊禾，字去非，元福建建阳人。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朱子之门人辅广。宋咸淳间进士，宁武州司户参军。宋亡，隐居不仕，筑云谷书院以教生徒，郡有考亭书院，学者称勿轩先生。著有《大学广义》二卷、《读书记》二十五卷、《经问》四十卷、《勿轩集》八卷等。

② 鬯辜：分割、肢解牲体。鬯：剖，剖开。

车上横板，手所凭仗以致敬者，升车则马动，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自然有个节奏，若车速则不相应，迟则不响，又杂然都响，皆不合节奏。二逐木曲，谓御车随逐木势之屈曲而不堕水也，鸣和鸾者御之常，逐木曲者御之变。三过君表，如辕门之类。四舞交衢，衢，道也，谓御车在交道，车旋应于舞节，如个十字街头模样，若转过这一边，则须要转得合舞底节奏。五遂禽左，谓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边，须要当得过左边以就主人之射。六书：一象形，谓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鸟兽、虫鱼、鬼物、器用、服饰，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类，亦有象形兼会意谐声者。二会意，谓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之类，会合人意也。如後字从彳从么从又，即三体会意也。三转注，谓文义相近，但旁边改转，如考即老之类。四处事，谓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各有其处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谓令长之类，一字两用也。六谐声，谓形声一也，如江河之类，皆以水为形，以工可为声也。工与江皆从经坚，可河虽反异，而音亦近。疏曰：‘书有六体，形声实多，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婆婆之类是上声下形，围圉之类是外形内声，闾闾衡衡之类是外声内形，此声之等有六也。’九数：一方田，以御田畴界域，即今丈量田地亩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质变易。粟是米，布是钱，谓以多少钱粟得多少谷之类。交是买卖，质是典约，变易是撞换。三裒分，以御贵贱廩税，此是理会官员俸禄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类。廩谓廩禄，税谓采地所收之税。四少广，以御积幂方圆。积幂，如今仓然，积米其中，外而遮蔽了，方圆以其器而知多少，今税务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装载了货物，用锥探其深浅，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圆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积实，商其功程，如打土论方子，打算一方土，便会会计得合用几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几间几架、合用几多人工之类。六均输，以御远近劳费、均其道里，远近之劳与费，劳是力，费是裹足如自某处到某处，用力几何、裹足几何之类。七盈朒，以御隐杂互见，盈是多，朒是少。数之显者可见，隐者不可见，至于杂则尤不可见，由见显者以推其隐，如人有财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无可考究，隐杂互见，是因其所存以验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错揉正员，今作历者用此法，谓人算钱逐件除下，零细底绝长补短，凑得齐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齐便将闰月来补凑，每月做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个行之会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广远，横为勾，直为股，斜为弦，三者都可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积，求之则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广、道路之远可以测知，此算术之极致也。勾股之术如今木匠，曲尺头为勾，尺稍为股，尺头与尺稍尽处相去为弦。”永嘉史氏曰^①：“以文对节而言，便是天理、节文之节

^① 永嘉史氏：不详。疑为史伯璿。《宋元学案》卷六十五：“史伯璿，字文玘，平阳人也，笃志朱子之学，时诸儒虽宗朱子，然饶氏《辑讲》、许氏《丛说》、胡氏《通旨》、陈氏《发明》亦多互异，乃著《四书管窥》以辨明之，又取诸经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证为外编，或劝之仕，则曰‘读书本以善身为仕，而学非吾志也’。卒不出。”

文，分而言之，亦对举以互见耳。”朱子曰：“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从小学中学了，大来都不费力，节斋氏释名物者非是。”【附纂】①景氏星曰②：“《大学》所言，不过学与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学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赋，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与气而已，理寓于气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盖大学所以教人者，不过使复其性尔，两‘大学’字不同。上指此书言，下指学校言。”黄氏洵饶曰：“则既之既，已然之辞。仁义礼智之性即天命之谓性，‘然其气质之禀’至‘而全之也’一节言气质之禀，人人皆异。性之所有，指仁义礼智而言，‘一有聪明睿智’至‘以复其性’一节言得其气至清者，自然能尽其性，聪明睿智，耳无不闻，心无不通。”又曰：“思之通彻曰睿，智之周遍曰智。”又曰：“治谓法制禁令，教谓政事设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说，‘尽其性’就圣人行上说，‘复其性’就学者行上说。‘继天立极’即‘皇极’之‘极’，‘极’字本义是屋栋，借以为至高至中之喻，王谓天子，公谓诸侯。”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③，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音的。子④，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新安陈氏曰：“凡民惟贤者得入大学，不比小学，则无贵贱贤愚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新安陈氏曰：“三代有小学、大学之教法，未有书也。天子元子，继世有天下。众子建为诸侯，公卿大夫元士适子，将有国家之责。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将用之，以佐理天下国家者也。穷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附纂】元子承位。元士，上士也。

夫音扶。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术即法也。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新安陈氏曰：“上言学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为立教之本，即所谓为亿兆君师继天立极者也。躬行心得，谓躬行仁义礼智之道，心得仁义礼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彝伦，常理也。”【通考】程氏复心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教之次第也。小学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教之节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为弟，即此推之，自有余也。如子当孝而教之孝，幼当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韩氏古遗曰⑤：“言外便有佛老。”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去声。下同。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音

① 附纂：指引用(元)黄宽《四书附纂》的注文。黄宽，字洵饶，福鼎人，事亲孝，苦学工文，世变避兵，以忧戚卒。著有《四书附纂》、《时事直纪》。《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有传。

② 景氏星：(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景氏星四书集说启蒙》：“《姓谱》：‘景星，字德辉，余姚人，洪武中官杭州儒学训导，其学长于《春秋》，今惟《四书启蒙》行于世。’”

③ 元子、众子：太子和其他诸子。元子：天子及诸侯的嫡长子。众子：指嫡长子以外的诸子。

④ 元士：官名，天子之士，以区别于诸侯之士，士是次于大夫的官职。《周礼注》：“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

⑤ 韩氏古遗：《宋元学案》卷六十四：“韩信同，字伯循，福宁人。”“学者称为古遗先生，又号中村，所著《四书标注》四卷，《易》、《诗》、《三礼》旁注书集解书讲义诸史，类纂若干卷，诗文集十余卷，其门人曰王樵翁，字马山。其婿也曰黄洵饶氏，明纂《大全》多采黄氏之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免。焉以尽其力。云峰胡氏曰：“前说上之所以为教，此说下之所以为学。”新安陈氏曰：“性分固有，即仁义礼智，是理是体，职分当为。如子职分当孝、臣职分当忠之类，是事是用，知性分职分，是知之事。俛焉尽力，是行之事，与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应。【通考】吴氏程曰：“‘无不学’是说小学以来事，‘其学焉者’则专言大学。”【附纂】黄氏洵饶曰：“‘性分’谓仁义礼智信固有，谓天命职分，谓五伦。”此古昔盛时所以治去声。下同。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通考】东阳许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也’为第一节，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设教之法至周大备。”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废回反。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新安陈氏曰：“皇帝生当地气运盛时，所以达而在上，以身为教，而道行于当世。孔子当地气运衰时，不免穷而在下，以言为教，传诸其徒，而道明于后世而已。”【通考】东阳许氏曰：“诵传先生之法，兼大小学言，‘传’是传之当世，与下‘诏后世’对说。”【附纂】黄氏洵饶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隤堕，渐与地平，教化渐废，亦类于此，风俗颓败谓治下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谓君；教，谓师，古者君师只一职，二字一篇骨子。”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馀裔。馀制反。番易【校记：弘治本、三鱼堂本作“阳”。】齐氏曰：“《曲礼》、《少仪》、《内则》，见《礼记》。《弟子职》见《管子》。此四篇作于春秋时，三代小学之全法，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馀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主流者。馀裔，衣裾之末也。”【附纂】东阳许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馀者，事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与衣比，谓支分之流、馀末之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问：“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朱子曰：“这个须先识得外面一个规模如此大了，而内做工夫以实之。凡人为学，便当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乃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须是志于天下，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也。所以《大学》第二句便说‘在新民’。”新安陈氏曰：“规模之大，指三纲领。节目之详，指八条目。孔子时，方有《大学》一章之经。”东阳许氏曰：“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天下平。”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去声。义，以发其意。曾子方有今《大学》之传，以发明孔子之意。【附纂】黄氏洵饶曰：“‘宗’者正也，‘传’义谓十章之义，‘发其意’谓发经文之意也。”及孟子没而其传泯音。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上声。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朱子曰：“自圣学不传，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其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新安陈氏曰：“记诵，口耳之学。词章，枝叶之文。”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

于大学而无实。问：“异端何以高而无实。”朱子曰：“吾儒便著读书，逐一就事物上理会道理，异端便都扫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将这些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云峰胡氏曰：“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所以高而无实。”新安陈氏曰：“老氏虚无，佛氏寂灭。”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音扶。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先则反。下同。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朱子曰：“秦汉以来，随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人挟其私智，以驰骛于一世。”新安陈氏曰：“权谋术数，谓管仲、商鞅等。百家众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张氏师曾曰①：“俗儒用功过勤而昧于道，异端寓意高远而杂乎中。权谋术数，如纵横讖纬；百家众技，如农圃医卜。”临川吴氏澄曰②：“儒者之学分而为三，秦汉以前则然矣，异端不与焉。有记诵之学，汉郑康成、宋刘原父之类是也；有词章之学，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之类是也；有儒者之学，孟子而下周、程、张、朱数君子而已。”【附纂】黄氏洵饶曰：“权谋术数，所谓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韩非、申不害之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眉庚反。否塞，东阳许氏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气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复沈俗作“沉”，非。痼，音固。东阳许氏曰：“反复，是展转愈深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没于水而不可浮。痼，如病着于身而不可愈。”【附纂】黄氏洵饶曰：“晦盲否塞，反复沈痼，如耳目不聪明，如气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扶倒之说。”以及五季谓梁、唐、晋、汉、周，五代季世。之衰，而坏乱极矣！云峰胡氏曰：“惑世诬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义，使斯道壅而不能行。晦盲，全无能知者。否塞，全无能行者。所以为坏乱之极也。大道之要，是大学书中所载者。至治之泽，是自大学中流出者。上之人无能知此大学，故君子不得闻大道之要。上之人无能行此大学，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泽。”【通考】张氏师曾曰：“‘坏’音怪，《学记》曰：‘坏，乱而不修。’”东阳许氏曰：“及周之衰，至此为第二节，首言上无圣君，而教移于下，‘记诵’以下，言人亡政熄。”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两夫子谓伯子、叔子，伯子讳颢，字伯淳，号明道先生。叔子讳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通考】按张达善点本，于是出而有以连下文作一句，或以出字断者，非是。张氏师曾曰：“程氏之学出于周子，而周子之学则得乎不传之绪也。今朱子《大

① 张氏师曾：《明史》卷一百三十三：“张师曾《四书集注句读、音考标题》三册，宣城人。”又《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亡名氏《四书集注》，未见。杨士奇曰：‘右《四书集注》其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善本也。’”

② 吴氏澄：吴澄（1249—1337年），元崇仁人，字幼清，人称草庐先生。至大初为国子司业，迁翰林学士。通经传，对《易》、《书》、《诗》、《礼》、《春秋》皆有著述。有文集一百卷。《元史》有传。参见《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